

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

任剑涛 主编

Governing for Prosperity

繁荣的治理之道

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

[美]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希尔顿·L·鲁特

Hilton L. Root

主编

叶娟丽 王鑫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

任剑涛 主编

Governing for Prosperity

繁荣的治理之道

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美]

主编

希尔顿·L·鲁特

Hilton L. Root

叶娟丽 王鑫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繁荣的治理之道 / (美) 梅斯奎塔等主编; 叶娟丽, 王鑫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任剑涛主编)
ISBN 978-7-300-08083-3

I. 繁…
II. ①梅…②叶…③王
III. 政治制度-关系-经济发展-研究
IV. D033 F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4232 号

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

任剑涛 主编

繁荣的治理之道

[美] 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 主编
希尓頓·L·魯特
叶娟丽 王 鑫 等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规 格	155 mm×230 mm 16开本	版 次	2007年6月第1版
印 张	19 插页 1	印 次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68 000	定 价	28.50 元

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与政治生活的演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向纵深推进——改革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各种社会要素相互匹配的综合体制改革。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如何营造一个经济与社会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条件，保证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客观上需要人们思考，在经济之外的范围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这个时候，社会政治的思考，与社会的现代发展问题就紧紧地结合起来。现代政治学的理论需求也就随之产生。

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急需政治学理论给予理论支持。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地聚集政治学的理论资源，认真严肃地思考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同时，要求我们将眼界放宽，“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毛泽东语），尽力

翻译出版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前沿著作，使我们的政治学思考与最新的理论发展相贯通。

我们之所以一方面要强烈关注自己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要努力引介现代西方最前沿的政治学理论，是因为西方政治学界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体验最为贴近和最为深刻，他们对现代政治学的理论推进，已与现代政治生活的演变直接关联在一起。要了解现代政治生活的状态，以及想了解现代政治学理论的最新进展的人们，不能不将自己的视野投向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现代”的体验，我们处于初级的阶段。而西方人的体验则比我们长久和深刻。这是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先发性特点所决定的。他们在现代化的体验中，对于现代化提出的诸政治问题的解答，对于现代政治行动方案的设计，对于不同价值立场的政治学言说的评论、建构、解构与重构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西方的古典政治学理论发展源远流长。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也颇为壮观。承接这种理论传统，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演变，既非常复杂，又线索明晰。撇开价值立场不说，现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沿循几个线索展示自己的理论内涵：在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上，政治学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诸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问题，继续进行着富有理论力度的阐释。在说明政治生活的现实问题的角度方面，政治学拓展了研究视野，将统治的传统主题逐渐转变为治理的主题，并使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区域治理、组织治理等具体的问题凸显在政治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在比较的视角方面，政治学研究以更为宽阔的视界，从类型的比较、历史的比较、现实的比较等不同的理论角度，对于我们理解复杂的现实政治世界提供了多角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的新探求方面，现当代西方政治学结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开辟了政治学研究的崭新方法路径。这些方面的成果，我们确实有必要加以筛选、甄别，以我们的政治学理论需要，加以吸收、借鉴、转化、提升，从而建构我们“中国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

中国有悠久的政治学理论发展历史。从百家争鸣到晚清启蒙思潮，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密切互动，促成了中国政治学理

论的历史发展。到了近代，政治学与政治生活就原来的关系结构而言发生了分离，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与实际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复杂的关联。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由于中西古今因素更加复杂的交汇，政治理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正是在这种处境中，我们期待通过西方政治理论的引进、消化，中国传统政治理论遗产的整理、转化，将政治理论切入中国政治生活，增强政治理论服务于现代化政治进程的需要，从而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本丛书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985”二期“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家创新基地资助项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组织翻译。这套译丛由马骏、何高潮两位教授具体主持。他们两位都是留美博士，对于西方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相当了解，能够直接选取一些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有益的西方政治理论前沿著作，推介到汉语读书界。这对于建构汉语现代政治理论、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方案，都是大有裨益的。丛书的推出，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全力支持，特致谢忱。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任剑涛

当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融合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现象的解释需要借助于经济学的理论工具，而经济增长的轨迹完全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安排。于是，就有了新政治经济学。将国家、政府、制度等传统的政治学主题纳入经济学的视野，标志着经济学理论向政治学领域的全面挺进。是挺进，并不是侵占，经济学在繁荣自身的同时，也给政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动力。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形成了某种新的经济学，还不如说是形成了某种新的政治学。制度重新受到关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开始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制度安排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达到最优的繁荣治理之道，正是本书的主题。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梅斯奎塔等主编的这部《繁荣的治理之道》，从历史的和现实

的层面，通过大量的经验数据和历史资料，全面分析了政治秩序、政治制度、民主、法治等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名家的佳作，如其中作者之一诺斯，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将拉美和北美独立后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比较，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理论借鉴。

当然，由于作者自身无法克服的价值影响，本书的意识形态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如关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一些判断，明显带有作者自己的偏见。相信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我们从本书中需要学习和吸收的是这些学者研究经济现象和政治问题的一些独特的方法和视角，并不是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

本书的翻译历时近一年。具体分工如下：第1章，叶娟丽；第2章，叶娟丽、刘翠翠；第3章，刘翠翠、叶娟丽；第4章，叶娟丽、程志高；第5章至第9章，王鑫、叶娟丽。本书目录、参考文献、作者简介由叶娟丽翻译，术语索引由叶娟丽、王鑫翻译，全书由叶娟丽校对和定稿。

本书的翻译力求忠实于原文，在保证原文意思不被歪曲的情况下对语言略加修饰。但由于时间关系，本书翻译得比较仓促；而且，由于是多人合作翻译，各章之间语言的运用和衔接可能不太和谐，尽管在统稿和校对过程中已经尽力加以克服，但瑕疵依然存在。如关于拉美国家的某些专有名词，使用的不是英文，无法从标准的英文辞典中找到对应的单词，所以也就无法准确地翻译成中文；还有对东南亚国家一些人名的翻译，也是颇费周折。因此，我们的翻译无法保证精确练达，能够不对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就是我们的奢望。

叶娟丽

2006年12月

目
录

第 1 章	当坏的经济成为好的政治.....	1
	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	
	希尔顿·L·鲁特	
第 2 章	秩序、无序和经济变化:	
	拉美对北美	18
	道格拉斯·C·诺斯、威廉·萨默希尔、 巴里·R·韦恩加斯特	
第 3 章	政治制度、政治生存与政策	
	成功	64
	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	
	詹姆士·D·莫罗	
	伦道夫·M·西瓦森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	
第 4 章	强制保护: 信息不对称的政治根源 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风险	91
	希尔顿·L·鲁特、纳哈勒尔·雷利斯	

第5章 政治不稳定下的工业繁荣：墨西哥革命分析.....	116
史蒂芬·哈柏、阿曼德·拉佐	
第6章 社会政治不稳定与发展问题.....	164
保罗·J·扎克	
第7章 政治制度、经济增长与民主发展：以亚太地区 为例.....	185
冯毅	
第8章 民主与法治.....	223
罗伯特·巴罗	
第9章 提高援助发展的效用.....	246
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	
希尔顿·L·鲁特	
 参考文献.....	255
致谢.....	270
索引.....	273

当坏的经济成为好的政治

布鲁斯·布恩诺·
德·梅斯奎塔·
希尔顿·L·鲁特

1 20世纪初，人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集体所有制是通往繁荣之路，而市场力量中非计划的方面不可能优于集中计划体制。经验事实已经令人信服地为许多智者所信奉的东西恢复了名誉。那些采取集体主义的、集中计划的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经历了政治和社会的巨变。相反，在市场经济下即使在劳动力成本增长的情况下，也产生了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强劲的竞争力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有关社会主义模式作为资本主义替代品的优越性的争论似乎结束了，市场经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然而，大多数人仍然每天生活在饥饿、贫困和疾病的煎熬之中。这些是可避免的，它们不是未知或者不可避免的自然力量的产物；相反，它们是由某种政治制度引发的、由不正当刺激所导致的可逆制度的失败和政治失败的产物。

经济成果中的许多变化，不可能再归结于对

什么会促进经济增长的无知。观察家们在解释民族经济失败时，必须看到竞争的经济理论以外的其他地方。今天，经济成功或者失败的关键，事实上也可说是广义的政策部署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关键，在于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安排激励政治领导人要么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要么断送民族走向繁荣的前景。如何为繁荣而治理，看来是 21 世纪最大的政策困惑。

这个栏目中关于政治经济的章节试图为这一困惑提供解决方法。每一章都分析了制度安排是如何刺激和鼓励经济增长或经济倒退的。本书的中心议题是：提供关于国家经济增长的知识，即解决贫困的关键在于建设一种能够激励政治领导者致力于公民福利的政治制度。社会不必等待有公民意识（civic-minded）的领导者来改善公民福利，但社会必须建设那些在保护政治权力中能够反映领导者利益的增长制度。在很多事例中，制度安排能够将坏的公共政策引向好的政治结果。

² 我们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推动力：政治家们为物资分配（distribution）进行斗争的推动力和为保护未来的利益而促成一致（coordinate）的推动力。是选择为眼前的物资分配而进行斗争还是为未来的利益促成一致，取决于与职责相关的政策（incumbents）是倾向于分配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或者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还是保住官职。而这一点，反过来是他们所处的政治制度的一个功能。民主国家的某些特征决定了其焦点是私人物品的分配，而独裁政府（autocracy）的主要方面则决定了其更关心私人物品的分配问题。

在正常环境下，政府通过税收、法规和政府支出来分配资源。领导者们可以选择全体受益的公共物品分配形式，或者只是其亲信受益的私人物品分配形式。当领导者选择特权分配方式时，他们会通过市场分权决策、削弱经济和根据某一位领导者的偏好减少总的资源量来干预有效的分配。至于领导者们为什么会心照不宣地选择那些导致经济衰退的政策，则是导致当今世界贫困现象的一大难题。

经济学家将那些不会有意促成经济危机的领导者们看成是提高他们社会福利的良好代理人。本书认为，故意的政策失误是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并力图为领导者们在留任动机中遇

到的两难问题寻找一个解决方法。政治领导者流连于权力。他们为追求政治忠诚不惜以牺牲经济为代价，包括采取特权的资源分配方式，从而削弱国家的经济成就。尽管行使特权会使运行良好的国家经济陷入危机，但领导者们还是会不顾经济成本，直到他们耗尽资源，得以留任：他们在乎的是政治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只会在职责行使不能获得足够的忠诚得以留任时才会出现。政治家们只在经济危机变成为政治危机时才会担心。

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经济危机何时会变成政治危机。一般而言，当领导者为了留任而被要求满足支持者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时，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当私人物品必须在足够多的人中间进行分配以得到支持者中最大多数人的价值认定时，领导者们被迫将资源当成公共物品，并因此通过市场决策来分配。相反，独裁领导者留任只需要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即可。对于小部分支持者，独裁者可以选择将资源当成私人物品的方式来留任，将资源奖赏给那些支持自己的亲信。因此，对于独裁者来说，经济危机不代表政治危机，他们在思考分配问题时，可以不关注一般的或者将来的繁荣。民主制度剥夺了领导者们的上述选择，迫使领导者必须通过正式的、制度的约束来提出有效的公共政策以避免经济危机。这种动态关系，不同于选举，是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症结所在。³

一些关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运用民主国家的逻辑来分析非民主国家的稳定，认为促成一致是政治的主要问题，制度变迁依赖于促成一致。这种论点合理地解释了当政治对手间促成一致主导着他们的分配决策时，政治危机是如何导致制度剧变的。这些变革例子包括法国大革命、光荣革命（Glorious）、俄国革命、日本明治维新、美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很明显，有些制度变革甚至在危机之后似乎确保了对达成一致的强调，而其他则仍旧像平常一样保留了分配冲突。学者们很少关注公共政策执行不力时作为政权维持基础的政治理性，因为那些得以维持的政权被严重地忽视，变革仅仅关心那些重大而又少见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革命是达成和解的产物（戈德斯通，1991；小摩尔，1966；斯科克波尔，1979；蒂莉，1978，1993）。

每一章都考察了解决或避免分配和达成一致问题的途径，借此作为解决或避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方式。由诺斯、萨默希尔和韦恩加斯特撰写的第 2 章，分析了应对经济危机的成功措施和失败措施之间的区别。作者识别了经济秩序的根本制度特征，解释了为了维持秩序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他们没有说明政治权威为什么应该鼓励去提供秩序。因此，他们提出了本书两个概念框架中的一个。第二个概念框架，是在第 3 章中由布恩诺·德·梅斯奎塔、莫罗、西瓦森和史密斯概括的，涉及政治权威在维护秩序或无序（disorder）时的动机。很多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极度的无序状态，如墨西哥和印度，书中对两个国家都进行了讨论。在第 5 章关于墨西哥的讨论中，哈柏和拉佐评价了无序状态的成本和利益，并且指出，即使革命性的变革也不能被指望可解决分配问题或者变更经济增长方式。鲁特和雷利斯以一种补充方式在第 4 章指出，如果没有同时采取民主的公共行政管理制度，即使采纳民主的治理原则也不能保证解决危害经济增长的分配问题。扎克的第 6 章更加关注政治不稳定（political instability）对经济变革的影响，而冯在第 7 章和巴罗在第 8 章重点说明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率的宏观影响。

第 3 章和第 4 章考察了领导者们提供秩序或者坚持无序统治的政治动机。这些章节涉及政权允许或者甚至鼓励领导者们通过对国家资源的错误处置来统治的范围。通过这些分析，他们对无序如何能够刺激—兼容政治生存有了新的解释。他们注意到私人利益分歧是日常政治的关键特征，并表明这些分歧何时会促进或者阻碍政治生存。本书通过在一些章节中讨论和解问题，而在另外一些章节中则相反地讨论利益分歧的冲突导致的紧张关系，涵盖了对基本的社会变革的补充性的洞察这一全部领域。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们通过假设决策者和公民具有某种共同利益而领导者们仅仅需要那些如何最好地意识到那些利益的信息，以此来提出经济改革的议题。我们不同意。分配差别使得决策者们通过惩罚性策略而不是协作（cooperation）来解决政治分歧。弱一些的政党要想成功，必须接受现状，因为它们仅仅通过领导者的慷慨才能增加自己的福利。当经济危机削弱

了领导者分配足额资源的能力时，政治忠诚规则也就会随之削弱，因为它依赖于领导者提供私人奖赏的能力。因此，危机为制度变革提供了瞬间的机会。这样一来，经济学家们提出改革的方法，只是部分地契合对危机的干涉，但它低估了那些维持低效经济政策惯例的强度。一场危机可以削弱领导者奖赏忠诚者的能力，因此使经济变更成为可能。然而，只有当危机迫近，才会出现此类情景。多数情况下，社会被那些有损于繁荣和福利的经济政策所包围。经济学家们提供的经济政策解决途径，是试验性的，确实有助于促进繁荣，但是它们很少能够对抗那些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刺激。通过区分这些刺激不同的制度来源，我们试图为经济改革提供真正的政治经济，并弥合经济学家们提供的途径与取得和保持政治权力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分歧。

本书尤其注意从论及解决或者处理分配冲突的文献、论及在社会变革（经常是由现存的统治机器垮台促成的）时如何共享（shared）信息的风险和达成一致的文献中吸取补充的制度方面的资料。政治的基础性问题就是没有明确的方法同时解决在危机中占统治地位的和解问题与分配问题（莫罗，1994），
5 这是政治常见的特征。原因很简单。达成一致要求共享信息，分配动机导致抑制信息。那就是为什么关注达成一致的政府，像民主国家，会强调法律和政治透明度（transparency），而独裁政府则强调不透明以影响人们的判断力。危机为建设新的制度提供了一个焦点，因为精英们的利益分歧因缺乏值得为之斗争的资源而被消除。而当危机没有发生时，控制社会财富的竞争最终会促使危机产生，除非精英们同意设计制度以阻止他们之间的竞争退化为混战。政治领导者们很少有那种远见，为了下一代的福利而牺牲眼前的真实利益。

政府如何在失败时还保持权力？

当窃取国家的资源成为美德时，有些事情从根本上就错

了。然而，统治扎伊尔 20 多年的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提供了一个政治领导者快速地破坏世界人民福利的实例，尽管非常极端。他宣称，“谁偷了钱放在扎伊尔的家里而不是国外，我祝贺你。”^[1]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政府既不能提供和平，也不能提供繁荣。领导者的寿命反而跟政策执行相关联。布恩诺·德·梅斯奎塔、莫罗、西瓦森和史密斯在第 3 章表明，独裁政治下的领导者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多于 40% 的人还能强化他们的权力。相反，在民主国家，如果不能促进经济增长，50% 以上的领导者会冒被撤职的风险。要求产生繁荣的政策通常使领导者失去权力，收入增长与政治生存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本书将通过区分为繁荣而治理的动机，来讨论如何改变这种不幸的相关。

学者们通常相信，政权类型决定政府对其人民所提出要求的应对能力。跨国比较并不支持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印度是一个执行贫困政策的民主国家；韩国和新加坡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进行了显著的经济改革。事实上，大多数独裁政府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或获得商业部门的信赖。然而，所谓的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别，可能和它们与民主国家的差别一样大（鲁特，1996）。

正如巴罗在第 8 章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国家通常导致妨碍经济增长的再分配政策。因为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中间选民会获得可观的再分配利益，再分配政策吸引了大多数人。在独裁政府统治下，领导者不必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他们在利用他们所控制的经济盈余方面享有很大的经济自由。尽管有些领导者可能自己侵占那些经济盈余，而其他一些则有志于投资于成功的经济增长政策，因为独裁政府下不考虑中间投票人，人们认为它们的政策包括经济增长政策的性质比民主政府下变动更大。事实上，独裁政府其经济增长率的可变性（variance）是民主政府下的两倍。^[2]当其领导人寻求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时，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表现为独裁政府。

自 1974 年以来，30 多个独裁政府开始向民主制度和平转变。向成功的经济政策的转变少了一些戏剧性，并不是政治变迁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变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政治危机通常会促进制度变迁并带来经济增长。亚伦·托

内尔已经算出，“1970—1995 年间，事实上 80% 的贸易改革出现在经济危机或政治剧变中，尽管每年在具体的国家出现改革的可能性是 3%，但当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剧变时这种可能性是 60%。”^[3]

然而，经济危机同时也会导致不稳定从而妨碍投资（investment）。因此，这种政治不稳定真正影响下的经济增长并不清楚。诺斯、萨默希尔和韦恩加斯特（第 2 章）认为，政治秩序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他们的论述集中在解决投资者比较敏感的责任问题。比如，他们认为，没有保障产权（property rights）的政治制度，是非常难以吸引投资的。他们对一段时期的美国和拉丁美洲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考察过去 30 年 7 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冯（第 7 章）也认为，稳定，包括政治上的一致和政治经济自由，会促进经济增长。扎克（第 6 章）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政治稳定（political stability）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他解释了不稳定是如何导致资源偏离其最有效利用的轨道的。然而，哈柏和拉佐（第 5 章）则主张，至少在墨西哥，“政治不稳定阶段……对投资者的信心、新厂房设备和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公司进出口率、工业结构和生产力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 1—1 显示了有关经济增长的经济记录和政治不稳定的三个截然不同的指标：被考察国家每年主要制度变革的数量、主要内阁变化的数量和试图政变（coups d'état）的数量。这一表格有助于区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哈柏和拉佐关于制度不稳定不是影响经济增长原因的论点，另一种是冯、扎克、诺斯及其同事关于政治秩序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观点。如上所述，哈柏和拉佐认为，制度变迁本身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影响。然而，政治领导的根本性变化，如政变和主要的内阁变化，确实有损经济增长。制度本身既可阻碍也可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改变制度可能从好的或者坏的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如果制度被用于保护政绩不佳的领导者，如果法律执行不力使得制度约束成为一纸空文，那么制度改革有利于经济繁荣。如果既有制度是用来加强和处罚不良政策的执行，那么它们的改变就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在执行法律的假象下，很容易建立